



QINHAN XUNXUE YANJIU

秦汉荀学研究

强中华 著



人民出版社



秦汉荀学研究

QINHAN XUNXUE YANJIU

强中华 著

人
民
大
学
社

责任编辑:姜冬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汉荀学研究/强中华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8
ISBN 978 - 7 - 01 - 017932 - 2

I . ①秦… II . ①强… III . ①荀况(前 313-前 238)-哲学思想-
思想研究-秦汉时代 IV . ①B222.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8741 号

秦汉荀学研究

QINHAN XUNXUE YANJIU

强中华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2.25
字数:329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7932 - 2 定价:5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序 论 / 1

第一章 秦汉士人对荀子生平及学派归属的认定 / 5

第二章 秦汉时期的天人观与荀子的关系 / 25

第一节 荀子的天人观 / 25

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主流天人观与荀子的分歧 / 34

第三节 秦汉时期的天人观与荀子的契合 / 52

第四节 王充的天人观与荀子异代同调 / 64

第三章 秦汉时期的人性论与荀子的关系 / 81

第一节 荀子的“人之性恶”论 / 81

第二节 韩非人情论与荀子性恶论的关系 / 91

第三节 韩婴、贾谊的人性论与荀子的关系 / 95

第四节 《淮南子》《春秋繁露》的人性论与荀子的关系 / 102

第五节 王充、荀悦的人性论与荀子的关系 / 115

第六节 秦汉时期人性论的理论困境 / 127

第四章 秦汉儒学与荀子的关联 / 134

第一节 荀子的“大儒”理想 / 134

第二节 秦汉儒学的荀学理路 / 143

第三节 汉代通经致用与荀子的关系 / 164

第五章 汉代《诗经》学与荀子 / 172

第一节 《鲁诗》与荀子 / 172

第二节 《韩诗》与荀子 / 192

第三节 《毛诗》与荀子 / 223

第六章 汉代礼乐与荀子 / 253

第一节 《史记》的礼学思想与《荀子》 / 253

第二节 《小戴礼记》与《荀子》 / 261

第三节 《大戴礼记》与《荀子》 / 269

第四节 汉代音乐思想与《荀子》 / 275

第七章 秦汉时期的法律与荀子的关系 / 289

第一节 荀子的法思想 / 290

第二节 秦朝的法律与荀子的关系 / 302

第三节 西汉初期的法律思想与荀子的关系 / 306

第四节 西汉中后期的法律思想与荀子的关系 / 315

第五节 东汉的法律思想与荀子的关系 / 329

结 论 / 346

序　　论

先秦时期，孔子、孟子、荀子等诸多先贤开创或发展了儒学，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荀子最受争议，引起了后人毁誉迥异的评价。大体说来，早在荀子在生之时，其学说就已遭到秦昭王、赵孝成王、临武君、陈嚣，以及他的弟子韩非、李斯等人的挑战。两汉时期，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考察，有不少士人对荀子褒奖有嘉，并继承发展了荀子的思想，但也有不少学者对荀子提出了批评。从政治与教化的实际操作来看，两汉政教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沿着荀子的思想理路而展开。自唐代思想家韩愈以“大醇小疵”评荀子，荀子在中国士人心中的地位日趋下降。特别是宋明理学，对荀子更是大加批评，甚至有的思想家主张把荀子从儒家门墙中驱逐出去；不过，亦有来自司马光、归有光、李贽等人的部分认同。有清以来，特别是清代中叶以来，荀子又受到傅山、谢墉、郝懿行、汪中、叶德辉、王先谦等众多士人的高度评价。晚清维新运动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夏存佑等却又把荀子视为中国两千年来专制政府的帮凶，荀子再度遭到非常严厉的指责；但此时亦有来自严复、章太炎等人的激赏。民国至今，人们对荀子的认识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按理，荀子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命运必然引起学界的深思：同一历史人物，为什么能够成为不同时代的争论热点，并引起冰火两重天的评价？在这些截然不同的评价背后，有着怎样的政治、思想、学术背景以及思维模式？荀子在中国文化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这一系列问题理应得到学术界的圆满回答。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荀子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荀子》版本考证、校勘校注、文本义理阐发、孔孟荀思想之比较、荀子对现代社会的启示等方面，而以上一系列问题却仍未得到全面、系统、深入的考察研究，有鉴于此，笔者不揣固陋，立志从事历代荀学研究。

何谓“荀学”？“荀学”或者“荀子学”这一提法，已经广为学界所用，但

学者们均未给出明确而具体的界定,不同的学者视野中的“荀学”“荀子学”所指也不尽相同。比如,谭嗣同“两千年来之学,皆荀学也”之“荀学”侧重于后世政教对荀子思想的实践。郭志坤《荀学论稿》^①、马积高《荀学源流》^②用“荀学”来指荀子本人的思想。此类用法,学界多有之。有的学者,特别是我国台湾学者又以“荀学”或者“荀子学”概括关于历代评价、研究荀子的学问,如饶兵《民国六十年来之荀子学》^③、陈秋虹《清代荀学研究》^④、田富美《清代荀子学研究》^⑤。大陆学人江心力《20世纪前期的荀学研究》^⑥亦属此种用法。可见,学界对“荀学”或“荀子学”并无一成不变的用法。笔者认为,“荀学”可以分为广义与狭义两个层面。狭义的“荀学”指荀子本人的思想。而广义的“荀学”应该包括荀子本人的思想;记述、评点、研究荀子生平、思想、影响以及有关《荀子》这部著作等相关问题的学问;有关荀子思想的接受与实践运用的问题,这一问题又分为显性与隐性两种。所谓显性接受与实践运用,指某种思想或社会实践明显受到荀子的启发,或者明显是在批判荀子的背景下发生的;隐性接受与实践运用,是指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某一思想或社会实践活动乃是受到荀子的启迪而发生的,但这些思想的内在逻辑却与荀子不谋而合,这些思想或社会实践活动不自觉地遵循了荀子的思想理路。把显性接受与实践运用纳入“荀学”研究自然十分容易理解,而隐性接受与实践运用的问题却需要在此作出说明:如果文献并未确凿记载某一思想或社会实践活动正是受到荀子的启发而产生的,但其内在发展理路却与荀子的思想不谋而合,这一现象其实更能证明荀子的思想具有前瞻性和合理性。相反,如果排除隐性接受与实践运用这一问题不研究,则既不能深层剖析某些文化现象的历史发展轨迹,又不能充分发掘荀子

^① 郭志坤:《荀学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

^② 马积高:《荀学源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③ 程发轫主编:《六十年来之国学》第四册,(中国台湾)正中书局1972年版,第232—266页。

^④ 陈秋虹:《清代荀学研究》,中国台湾“国立”高雄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1992年。

^⑤ 田富美:《清代荀子学研究》,中国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⑥ 江心力:《20世纪前期的荀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的思想价值。

笔者所谓历代荀学研究之“荀学”主要指第二和第三层面的荀学。当然,意欲深入探究这两个层面的荀学,就必须同时深刻理解荀子本人的思想,因此,历代荀学研究又必须同时兼顾研究第一层面的荀学。对于历代荀学研究,我们的总体构想分为六个层次:第一,通过对历代文献的详尽梳理,全面考察荀子的历史命运。第二,探讨不同时期导致荀子不同历史命运的文化背景^①,以及荀子思想的接受者^②的思想历程。第三,深入探讨荀子思想本身为什么会引起不同时期的不同评价,也就是《荀子》文本自身的开放性问题。第四,总结荀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实际地位。第五,以荀学这一个案为中心推演开来,探讨中国儒学诠释传统的特点与规律。第六,在以上研究基础之上,探讨中华民族的思维特点。以上构想无疑是一个长远科研愿景,其中,秦汉荀学研究仅是实现这一愿景的奠基工作。

本书研究的基本内容为:第一,秦汉学者对荀子生平的记述、学派归属的划分,以及这些记述与划分对后世产生的影响。第二,研究荀子的天人观在秦汉时期的历史命运,特别是考察荀子的天人观在汉代知音难求的原因,以及王充等人对荀子天人观的接受与发展。第三,秦汉士人对荀子人性论的回应,主要包括韩非、陆贾、贾谊、《淮南子》、董仲舒、扬雄、刘向、班固、王充、荀悦等士人的人性论与荀子人性论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以及秦汉时期人性论的理论缺陷。第四,荀子的儒学精神及其在秦汉时期的波折与最终实现,以及对中国古代政治实践、道德教育的影响。第五,荀子与秦汉经学的关系,主要详细考察《鲁诗》《韩诗》《毛诗》与荀子的关系,以及汉代礼乐思想及礼乐实践与荀子的关系。第六,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法律实践与荀子之间的关联。

就研究方法而言,本书采取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全面研读秦汉时期的文献典籍,梳理秦汉时期记述、评价荀子的相关文献,引述、化用《荀子》的相关文献,与荀子思想相同、相似、暗合甚至相反的相关文献。其次,

^① 此处之“文化”指广义的文化,包括政治、经济、教育、思想、学术等相关层面。

^② 这里所谓荀子思想的接受者既包括个人,也包括社会团体,还包括国家政权。

依据一定标准对以上文献进行归类与整合，并结合先秦时期的文化传统、秦汉时期的时代风气，以及秦汉士人的个性特征，考察这些文献与荀子之间的关联与区别，及这种关联与区别对秦汉社会乃至后世政治实践、道德教育、学术思想的影响。本著一方面对秦汉荀学相关问题作出事实梳理，同时又力争对这些事实进行深入分析与评价。在梳理、分析与评价时，“秦汉荀学研究”在阐释方法上吸纳中西阐释学，特别是傅伟勋先生“创造的解释学”的理论精髓，试图在阐释研究对象时，把“原作者（或思想家）实际上说了什么？”“原作者真正意味什么？”“原作者可能说什么？”“原作者本来应该说什么？”“作为创造的解释家，我应该说什么？”^①等五个阐释层次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做到既有客观事实的叙述，又有研究者的主观评价，甚至理论构建。

^① 关于傅伟勋先生的“创造的解释学”，参见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1—52页；潘德荣：《文字·诠释·传统——中国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化》，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156页。

第一章 秦汉士人对荀子生平及学派归属的认定

根据秦汉时期的文献典籍记载,可以大体了解荀子的生平事迹,但由于这些文献的记载较为简略,或者文献之间的记载存在抵牾,因此,荀子的生平成为后代一桩难以定论的学术谜案。

根据刘向整理的《孙卿子》一书来看,早在荀子在世之时,就有人对他的思想有所评述,荀子的弟子对他们老师的言论也早有记载与传述。比如秦昭王^①、应侯^②、赵孝成王、临武君^③、公孙子^④、齐相^⑤、陈嚣^⑥、李斯^⑦均论道于荀子。其基本内容为,以上诸人对儒家到底有何作用,对荀子儒家特色

① 《荀子·儒效》载,秦昭王抱着怀疑的心态问荀子:“儒无益于人之国?”荀子极力驳斥了秦昭王的谬论。关于此,《新序·杂论》亦有记述。

② 《荀子·强国》载,应侯(范雎)问荀子“入秦何见?”荀子赞扬了秦国的诸多长处后,指出了秦国缺乏儒家文化的潜在危险。

③ 《荀子·议兵》载,赵孝成问临武君和荀子,治兵的关键在于什么。临武君认为,“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荀子却认为,军事的关键在一民”“附民”,即团结民众,凝聚民众。临武君又提出:“兵之所贵者势利也,所行者变诈也。”荀子亦反驳之。临武君又问“王者之兵设何道”“为将”“王者之军制”等问题,荀子一一作答。《新序·杂事》对此亦有部分记载。

④ 《荀子·强国》载,公孙子赞扬楚人子发虽有功而辞赏,荀子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法度不宜遭到破坏。公孙子,《荀子》未言其名,杨倞注云:“齐相也,未知其名,《后语》:孟尝君客有公孙成。岂后为齐相乎?或曰,公孙,名忌。”

⑤ 《荀子·强国》载,荀子游说齐相,“处胜人之势”,必须“行胜人之道”,才能治理好天下。齐相,《荀子》未言其名,杨倞无注。后人或云即前文“公孙子”,或云田单,或云田文。

⑥ 《荀子·议兵》载,陈嚣问荀子:“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并提出:“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荀子批驳了陈嚣的浅见,提出,“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

⑦ 《荀子·议兵》载,李斯问荀子曰:“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荀子对此展开长篇大论,指出李斯见识短浅。

的军事思想提出了质疑，荀子则极力驳斥他们的短见。以上诸人虽然对荀子的主张多不赞同，但从其言论来看，他们均视荀子为儒家人物。

又根据《荀子·尧问》记载，后世有人高度赞扬荀子，甚至认为荀子的地位在孔子之上。其文云：

为说者曰：“孙卿不及孔子。”是不然。孙卿迫于乱世，鳍于严刑，上无贤主，下遇暴秦，礼义不行，教化不成，仁者诎约，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诸侯大倾。当是时也，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无睹，贤人距而不受。然则孙卿怀将圣之心，蒙佯狂之色，视天下以愚。《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谓也。是其所以名声不白，徒与不众，光辉不博也。今之学者，得孙卿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观其善行，孔子弗过，世不详察，云非圣人，奈何！天下不治，孙卿不遇时也。德若尧、禹，世少知之。方术不用，为人所疑。其知至明，循道正行，足以为纪纲。呜呼！贤哉！宜为帝王。天地不知，善桀、纣，杀贤良。比干剖心，孔子拘匡；接舆避世，箕子佯狂；田常为乱，阖闾擅强。为恶得福，善者有殃。今为说者又不察其实，乃信其名。时世不同，誉何由生？不得为政，功安能成？志修德厚，孰谓不贤乎！（《荀子·尧问》）^①

学界大多认为上述这段言论应为荀子弟子所作。这段言论至少有六个要点值得注意：第一，这段言论出现的历史语境应该是，当时孔子已经声名远播，荀子却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认为荀子不可与孔子同日而语，因此把他纳入“非圣人”之列。第二，有些学人却恰好相反，他们非常崇拜荀子，认为荀子道德高尚、智慧明达，其学说完全可用于治平天下。第三，激赏荀子的学人认为，即使是圣人孔子，也超不过荀子，荀子可与尧舜比美，甚至可以做帝

^① 本书所引《荀子》原文，若无特别说明，均出自王天海：《荀子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王。第四,认为荀子生前之所以不被重用,是因为那个时代不重视仁义教化。第五,认为荀子的学说对后代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第六,认为荀子不如孔子,乃是蔽于名而不知实的浅见。以上观点无疑颇有夸耀荀子的嫌疑,但其对孔子与荀子地位的认识亦有深刻之处,特别是“今为说者又不察其实,乃信其名”的说法,已经隐约意识到,人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在方法论上非常容易出现的偏差。毫无疑问,荀子与孔子相较,二人均强调人们特别是统治者的道德修养,此其所同;对于如何提高治国功效、增强国家实力,孔子亦有论述,但确实不及荀子精详。然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正统儒家文化偏重强调道德超越,对于如何提高事功效率却言之甚少,甚至不屑言及。^①这一文化价值取向经过一代又一代阐释者的不断强化,孔子提倡的道德精神受到了后代的顶礼膜拜,孔子本人也最终被阐释为“简垛式”的道德高标。而荀子较为精详的政治智慧却未能受到足够重视,其积极意义逐渐被人轻视,甚至遗忘。事实上,人类社会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生态系统,除了中国历代思想家津津乐道的道德品行以外,经济、政治、军事等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事实上非常巨大,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经济、政治、军事等社会活动的作用甚至比道德品行更为重要。然而,由于阐释者总是过度强调道德而轻视事功,长此以往,就非常容易形成如下悖论:某一学说对实际社会生活本来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但仅仅以道德标准来衡量,这一学说却不及另一种学说高尚醇正,于是,便会给人造成前一种学说压根儿就不如后一种学说的假象。这一假象经过代代强化,就会逐渐转化为一种文化惯性,被懒于反思的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真相”。荀子的弟子们提出“今为说者又不察其实,乃信其名”的说法,已经认识到以上这一悖论。可以说,他

^① 比如,据《论语·子罕》载,孔子“罕言利”。又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面对梁惠王“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的迫切之问,孟子当头棒喝“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秦、楚构兵,宋牼将以用兵不利为由,游说秦王、楚王,劝其罢兵。孟子亦如劝解梁惠王一样,奉劝宋牼,“何必曰利!”不能以利说人,而是应该“以仁义说秦、楚之王”。在孟子看来,若如此,“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又如,《大学》:“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董仲舒则提出:“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计其功。”(《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

们的看法已经隐约触及中国儒学阐释传统的特点与缺陷。这里所谓“阐释”，既指人们对前代思想家之思想的解释、地位的确认，更包括治国者对前代思想家之思想的宣扬。用作舆论宣传的思想，往往都会高于现实、超越现实，但这些高于现实、超越现实的宣传思想在现实生活中不一定都处处切合现实，落到实处，因此，这些思想在实际执行中往往都不得不打折扣。而真正指导现实生活的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更切合于实际操作的思想，但由于这种思想在道义上并不纯粹，因此作为治国的一种策略，虽然现实生活中不得不采纳这一思想，但不便道明，也不必道明采纳了这一思想。研究思想史的学者，如果仅仅从舆论宣传的多寡来判定某种思想影响的大小，就很容易像荀子的弟子们所指出的那样，犯“不察其实，乃信其名”的错误。

韩非是荀子的学生，其著作《韩非子》一书有两处记载似与荀子事迹有关。第一处，《难三》：“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故身死为僇。”^①这条信息说明，孙卿曾经到过燕国，但他的某一主张并未得到燕王哙的赞同。不过，对于《韩非子》的记载，后人或有怀疑，一是因为这条记载与《风俗通义》荀子“年十五始游于齐”的说法存在矛盾，二是因为难以与刘向《荀子叙录》说“孙卿后孟子百余年”互相吻合。孟子大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若按刘向关于荀子“后孟子百年”之说，燕王哙让位于燕相子之之时（公元前316年），荀子还没有出生，所以梁启超等人认为荀子与燕王哙不可能有交往。但是，梁涛先生列出了四条理由，认为《韩非子》的记载应该没有问题。第一，韩非是荀子的学生，他记载老师荀子的事迹，应当比晚很多年的刘向的记录更为可信，且《韩非子》的叙述内容非常具体，涉及荀子反对禅让及遭到燕王哙的非难等；而刘向《荀子叙录》“后孟子百年”的话只是泛泛而谈，不能把它作为推断荀子生平的确凿数字。第二，《荀子·正论篇》有批判尧、舜禅让旧说的内容，这可能就是荀子游燕时批评燕王哙的言论，《韩非子》记载燕王哙非难孙卿也应该是起因于这件事情。第三，《荀子·正论》有“二三子之善于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将恐得伤其体也”的记载，子宋子即《孟子·告子》中的宋牼，孟子称他为“先生”，应当是孟子的前

^① 陈其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06页。

辈。从《荀子·正论》的这段话看，荀子似曾见过宋涇，既然见过宋涇也必然有可能见过孟子，孟子的生卒年大约在公元前 372 年至公元前 289 年之间，在燕王哙禅让的时间范围之内，所以荀子与苏秦、燕王哙同时，绝对是没有问题的。第四，应该以《史记》荀子“年五十始来游学於齐”的说法为是，而不是应劭《风俗通义》“年十五”的说法，这样，荀子游燕不仅不可怀疑否定，反而与《史记》的记载是一致的。燕王哙于公元前 316 年禅让王位于子之，若此时荀子为二十岁左右，则他出生在公元前 336 年左右。^① 笔者认为，梁涛先生的推断应该是对的。因为刘向在整合《史记》两处关于荀子生平的材料时，误解了《史记》的原意，因此出错。而《风俗通义》又为了弥合刘向《荀子叙录》与《史记》“年五十始来游学於齐”的矛盾，故改“五十”为“十五”。

《韩非子·显学》提道：“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②“孙氏之儒”有的版本作“公孙氏之儒”。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孙氏之儒”就是孙卿，有的则认为指公孙尼子。^③ 由于《韩非子》的版本存在差异，记载又实在太简略，因此“孙氏之儒”究竟指谁目前仍然无法得出定论。

《战国策》关于荀子事迹的记载仅有处。其全文云：

客说春申君曰：“汤以毫，武王以鎬，皆不过百里，以有天下。今孙子，天下贤人也，君籍之以百里势，臣窃以为不便于君。何如？”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谢孙子。孙子去之赵，赵以为上卿。客又说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鲁入齐，鲁弱而齐强。夫贤者之所在，其君未尝不尊，国未尝不荣也。今孙子，天下贤人也，君何辞之？”春申君又曰：“善。”于是使人请孙子于赵。孙子为书谢曰：“‘病人怜王’，此不恭之语也。虽然，不可不审察也。此为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无

^① 梁涛：《荀况行年新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4 期。

^② 《韩非子新校注》第 1124 页。

^③ 《韩非子新校注》第 1127 页。

法术以知奸，则大臣主断国私，以禁诛于己也，故弑贤长而立幼弱，废正适而立不义。《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围聘于郑，未出竟，闻王病，反，问疾，遂以冠缨绞王，杀之，因自立也。齐崔杼之妻美，庄公通之。崔杼帅其君党而攻庄公。请与分国，崔杼不许；欲自刃于庙，崔杼不许。庄公走出，逾于外墙，射中其股，遂杀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见：李兑用赵，饿主父于沙丘，百日而杀之；淖齿用齐，擢闵王之筋，县于其庙梁，宿夕而死。夫疠虽痈肿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绞缨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饿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忧劳，形之困苦，必甚于疠矣。由此观之，疠虽怜王可也。”因为赋曰：“宝珍隋珠，不知佩兮。袆布与丝不知异兮。间姝子奢，莫知媒兮。媒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为明，以聋为聪，以是为非，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惟其同！”《诗》曰：“上天甚神，无自瘵也。”（《战国策·楚策》）

此段文字又见《韩诗外传》、刘向《荀子叙录》、应劭《风俗通义》，文字几乎相同，但《荀子叙录》《风俗通义》不载赋文，且为了避免后人把此处之“孙子”与孙武或孙膑混淆^①，因此改“孙子”为“孙卿”。《战国策》所载荀子赋文与《荀子》《韩诗外传》所载大同小异^②，大概是因为记录或传抄过程中产生的差异。从上段文字可以看出，荀子在楚国遭到谗言诽谤，说他是天下贤才，完全有可能借助春申君提供的便利条件，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反过来威胁春申君的地位。春申君听信谗言，辞谢了荀子，荀子到了赵国，被拜为上卿。此时，楚国又有人对春申君说，荀子这位贤人去了赵国，赵国的君主便会受到尊敬，赵国也会因此而兴盛，春申君不该辞谢荀子。春申君于是派人到赵国召见荀子。但是荀子写信拒绝了春申君，荀子在信中引经据典说，

^① 时人常称孙武或孙膑为孙子，比如《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把孙武和孙膑都称过孙子。

^② 《荀子》作：“璇玉璠珠，不知佩也。杂布与锦，不知异也。间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危为安，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维其同！”《韩诗外传》作：“璇玉璠珠，不知佩。杂布与锦，不知异。间娵子都，莫之媒。嫫母、力父，是之喜。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是为非，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维其同！”

人主年幼，自以为有才能，却没有办法识别奸邪之人，这样，大臣就会独断专行、图谋私利，一切权力归于自己。所以奸邪的权臣们弑杀年长而有才能的王子，废掉嫡子，而立不该继承王位的人。春秋时期，楚国的王子围奉命出访郑国，还未走出国境，听说王子围病重，于是返回宫中探视病情，借机以帽带绞杀王子围，随之自立为国君。齐庄公与崔杼的妻子私通，崔杼带领党羽攻杀庄公，而立庄公之弟为齐景公。近世以来，赵国的李兑擅权，饿死赵武灵王主父。淖齿在齐国擅权，抽了齐闵王的筋，把他悬于庙梁吊死。观荀子之意，乃是讽刺春申君愚昧昏庸，不辨贤愚，听信谗言，以一人之言谢绝荀子，又以一人之言召回荀子，毫无特操主见，春申君恐怕以后将会受制于小人。荀子的告诫与预见确实非常有道理——春申君后来被佞幸之臣李园所杀即是应验。^①

司马迁是历史上第一个为荀子作传的学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

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②

司马迁是第一个把荀子与孟子同列并称，并为这两位儒家先贤作传的学者。在司马迁看来，荀子和孟子同等重要，均为孔门传人，足见他对荀子的重视。

^① 《战国策》未言说春申君之客究竟为何人，后世亦无人考辨。假如此客就是赵人李园，则更能印证荀子的先见之明。

^② 本书所引《史记》原文，均出自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一版，1982年12月第二版。以下只注篇目。

《史记》还在其他几处提及荀子。《春申君列传》：“春申君为楚相四年，秦破赵之长平军四十余万。五年，围邯郸。邯郸告急于楚，楚使春申君将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归。春申君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以荀卿为兰陵令。当是时，楚复强。”似乎指出，楚国当时的强大与春申君重用荀卿颇有关联。只可惜春申君用人不专，后来逼走荀子，自己最终也被李园所杀。《儒林列传》：“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①司马迁特别强调了孟子和荀子在战国时期的贡献。《十二诸侯年表》：“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据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同胜纪。”指出荀子非常熟悉《春秋》，且著书多取材于《春秋》。《吕不韦列传》：“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可见，荀卿著书，点燃了吕不韦的文化热情。《老子韩非列传》记载，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这一记载为后人考察荀子的影响，以及韩非、李斯的学术渊源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文献。《李斯列传》载，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辞于荀卿曰：‘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斯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李斯喟然而叹曰：嗟乎！吾闻

^① “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应该为衍文，因为齐威王、齐宣王之际，在秦始皇之前。《汉书·儒林传》正无“后陵迟以至于始皇”语。